

片面追求 GDP 加大金融風險

■ 李義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導

●貨幣本來是交換的媒介，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是依附於實體經濟的。然而貨幣一旦從產業資本的運行中獨立出來，演化為金融產業，就會滋生出眾多的金融衍生品，變着法賺錢。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大量貨幣在各種金融衍生品中空轉，另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越來越高，民間高利貸瘋狂。

●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紙幣發行再多也難以變成資本。中央銀行多發的貨幣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壞的作用。好的作用是企業的產品確實有市場需求，只是缺少貨幣，企業從銀行貸款可以幫助渡過難關，進行正常生產。壞的作用是企業及其產品本來就應當通過調整結構被淘汰，這筆貸款只是延續了被淘汰的時間，甚至會抑制進一步的創新。

●GDP 掩蓋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和現代服務業、金融業的區別，為過度金融化、過度虛擬化提供了理論淵源。為了認識 GDP 的這一弊端，我們可以對照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的概念加以鑒別。

要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必須弄清金融風險形成的原因和机理，必須有理論層面的分析。理論是深厚的，它支配着政策和操作。感覺到了東西我們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

對貨幣的本質和功能的誤解

對貨幣的本質和功能的誤解，以及以這種誤解為基礎的政策舉措是形成金融風險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的經濟學深刻揭示了貨幣的本質和功能。馬克思認為貨幣是從商品交換中分化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在最初的商品和商品的交換中就包含着貨幣的因素。例如：1 只綿羊=2 把斧頭，兩把斧頭既是真正的社會財富，又扮演着貨幣的角色，不會發生通貨膨脹的危機。在交換過程中貨幣所以最終演化為金屬貨幣，是因為金銀最適合充當貨幣材料。馬克思強調，貨幣也是商品，是有價值的。馬克思研究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與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例關係，與同名貨幣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關係。流通中的貨幣量不是任意的。

馬克思研究了紙幣，強調紙幣本身並沒有價值，紙幣不過是金屬貨幣的貨幣符號，“紙幣只是代表金屬，才成為價值符號”。紙幣是由國家強制發行的，只在一定範圍內有效。如果紙幣的發行量超過了他所代表的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量，就會造成紙幣的貶值。馬克思說：“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貨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開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

馬克思指出了貨幣的職能，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世界貨幣，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貨幣最基本的職能。

在馬克思的理論里，貨幣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馬克思把產業資本分為貨幣資本、生

產資本、商品資本。商品資本分離出來成為商業資本是因為交易的专业化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貨幣資本分離出來成為銀行資本是為了融資的专业化。

然而現實經濟生活由於相關的認識和經濟政策等嚴重地脫離了貨幣的本質和功能：

1、貨幣本來是交換的媒介，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是依附於實體經濟的，實體經濟與貨幣的關係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然而貨幣一旦從產業資本的運行中獨立出來，演化為金融產業，就會滋生出眾多的金融衍生品，變着法賺錢。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大量貨幣在各種金融衍生品中空轉，另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越來越高，民間高利貸瘋狂。民間高利貸是現行金融政策和監管不力的結果。

2、貨幣在不经意间被當作了調控經濟的手段，被當作了金融技術官僚們可以任意把玩的工具。這就埋下了金融風險的伏筆。貨幣首先是價值尺度，即用來衡量價值的大小。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應當是穩定的。然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價值尺度變大，使得以貨幣表現的財富變小；緊的貨幣政策會使價值尺度變小，使以貨幣表現的財富變大。試想，一座房屋的東邊的牆用大的尺寸度量，西邊的牆用小的尺寸作為標準，這樣房子會穩固嗎？我們假定 8 只麵包=1 只鞋，當有了紙幣後，人們可以把 8 只麵包換成 8 元錢，用 8 元錢買 1 雙鞋。一切都沒有發生變化。現在還是 8 只麵包，想要 2 雙鞋，為此銀行又多發了 8 元錢，一共 16 元錢。造鞋的人會發現第一個 8 元錢用完了，第二個 8 元錢買不到東西了，貨幣貶值了。馬克思引用了一個銀行家的話說，資本便宜只會誘導投機。

3、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紙幣發行再多也難以變成資本。通常情況下，銀行多發新的紙幣並不是資本。中央銀行所進行操作的手段常常是貸款，並因此創造了金融資產和負債。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 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如果中央銀行可以簡單大筆一挥就增加本國和世界資本，那倒是奇怪的事。”中央銀行多發的貨幣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壞的作用。好的作用是企業的產品確實有市場需求，只是缺少貨幣，企業從銀行貸款可以幫助渡過難關，進行正常生產。壞的作用是企業及其產品本來就應當通過調整結構被淘汰，這筆貸款只是延續了被淘汰的時間，甚至會抑制進一步的創新。

上述分析證明，從貨幣的本質和功能出發，最好的杜絕和防范金融風險的政策是中性的、穩健的貨幣政策。

過度金融化加大金融風險

GDP 掩蓋了實體經濟和服務業，包括金融產業的區別，在片面追求 GDP、追求時髦產業的驅使下，過度金融化、過度虛擬化，加大了金融風險。

GDP 即國內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中宏觀經濟的概念，指一個時期、一個國家的國土範圍內，本國和外國國民所生產的供最終使用的商品和勞務的總和。GDP 掩蓋了許多



東西：第一，GDP 並不反映產品和經濟增長的質量。GDP 是一個總量概念，質量是由其物質構成決定的。第二，它掩蓋了自給自足的部分，進入交易的都可以計算到 GDP 里，沒進入交易的自給自足的則不算。第三，浪費資源對 GDP 是正的效應，自然的成本和環境的成本被忽略了。第四，有些增加 GDP 的行為實在是在無奈之舉，例如霧霾天口罩賣得好，工廠效益好，GDP 得到了提升。第五，有些有害的東西也可以增加 GDP。總之，GDP 的提升並不是天然地代表人民的福祉的增長，在有些情況下反倒可能是人民利益的損害。

更為重要的是，GDP 掩蓋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和現代服務業、金融業的區別，為過度金融化、過度虛擬化提供了理論淵源。為了認識 GDP 的這一弊端，我們可以對照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的概念加以鑒別。

馬克思研究了社會總資本及其再生產，相當於今天所講的宏觀經濟層面的問題。馬克思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堅持的是他的經濟學一貫秉承的實體經濟原則。他的理論體系中的宏觀經濟的概念是社會總產品和社會總價值，社會總產品是一個生產周期中社會物質產品的總和。馬克思具體把它分為第 I 部類即生產資料的生產，第 II 部類即消費資料的生產。與社會總產品相對應的是社會總產值，即兩大部類的產品中全部價值之和。國民收入是馬克思經濟學中另一個宏觀經濟層面的概念，同樣被嚴格限定在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即在社会總產品中扣除掉一年內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後余下的那部分價值，可以分解為 v 和 m 兩個部分。其中 v 為生產物質產品的部分的勞動者的工資，m 部分在資本主義社會為資本家所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是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可在全社會再分配。繼之，馬克思把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稱之為生產勞動，非物質產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稱之為非生產勞動。這些分析表明，在馬克思經濟學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包括金融產業是被嚴格區分的。馬克思推崇的是實體經濟。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即使今天看

來也是正確的。

GDP 掩蓋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區別，就會在片面追求 GDP 的時候過度金融化，甚至可能使經濟空心化。一些人甚至將金融業在 GDP 中比例的提高當作一種時髦。這種時髦不僅是片面追求 GDP，不僅是 GDP 掩蓋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區別，同時也是建立在對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誤解之上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隨着經濟發展，農業部門實現的國民收入會降低。在工業化階段，工業部門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會提高，在工業化後期，工業部門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會降低，服務業的貢獻會越來越大。但這有兩個前提，一是這是排除一切拔苗助長的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二就是就一個國家的整體情況而言的。現在的問是，一些地方囫圇吞棗地接受了配第-克拉克理論所提示的現象，明明相對落後，硬要發展現代服務業，還拼命提高金融業在 GDP 中的占比，並為此大力發展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規模，這隱藏着嚴重的金融風險。地方債是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

國債可以一直發下去的打算行不通了

1929 年爆發於美國的經濟大危機誕生了凱恩斯經濟學，這是一個備受各國政治精英青睞的經濟理論。古典經濟學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不會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經濟危機。歷史給了凱恩斯一個機會。凱恩斯不像馬克思那樣認為危機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沒有問題，危機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加之危機帶來的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人們不敢投資，不敢消費。基於上述對危機發生根源的判斷，凱恩斯認為靠市場自身是難以恢復的，不要指望恢復是一個自然過程，只有借助於政府的干預才能恢復。他認為促使復蘇的應當是擴張性財政政策。他的政策主張大致包括：首先要擴大政府的直接投資，興辦公共工程。他認為政府的直接投資

會發生乘數效應，即一定數量政府投資可以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一個就業崗位可以連帶地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其次是政府可以更多地舉債，特別是發行國債，可以多發貨幣。最後是鑑於收入低的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再分配應適度向窮人傾斜，以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為各國政府所青睞，原因在於：(1)如果“新政”是成功的，那麼，凱恩斯為新政的做法，即花費更多的貨幣啟動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2)政府直接擴大支出，向社會注入大量的貨幣以啟動經濟，在短期內收效明顯，這符合人們，包括官員的行為模式——人們都具有短期行為。(3)政府由精英組成，精英們通常具有超常的能力，喜歡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華。凱恩斯經濟學為政府直接發揮作用提供了理論基礎，是一種讓政府大有作為的經濟學，因而是幾乎任何政府都願意接受的經濟學。

歷史開了一個玩笑，凱恩斯經濟理論支撐的經濟政策，即情不自禁地刺激最終導致了滯脹，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如果沒有凱恩斯式的刺激，經濟可能恢復得更快，包括 1929 年的危機。經濟學發生了凱恩斯革命之革命，應運而生了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都更強調發展的自然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

凱恩斯主義所以導致了滯脹，原因在於：(1)所以發生危機，是在經濟快速發展時上了很多不應該上的項目，形成了經濟泡沫，危機是強制性擠出泡沫，強制淘汰落後、強制創新，是市場機制的自我修正。而刺激性政策沒有給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足夠的時間。在沒有創新和淘汰的情況下，只能形成既有層次的過剩產能，並累計為“滯脹”。(2)依靠杠桿支撐的經濟放大了人們的購買力和經濟發展能力，喪失了結構提升的機會，且泡沫是迟早要破的。(3)凱恩斯主義忽視了人們的心理預期和自我保護，在物價上漲時人們會要求增加工資，雅克布·布特曾經指出，“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會造成印刷機和工會之間賽跑”。這樣的輪番加價必然是價格上去了，經濟卻沒有實實在在發展的滯脹。(4)凱恩斯主義認為，國債不會被政府否認，債權人不用擔心着政府會失去信用。靠發新債還旧債是可行的。2011 年在歐盟國家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向人們宣告，國債可以一年一年發展下去的打算行不通了，連年財政赤字，國債越積越多，政府信用喪失了，人們也喪失了对政府債務的興趣。

通過以上這三個角度的理論分析，我們的結論是：(1) 讓金融應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實行普惠金融。(2) 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決做到不濫發貨幣，不隨意刺激，要有戰略定力。杜絕所謂金融深化的洋教條。(3) 遵循經濟規律，循序漸進地，實實在在地發展經濟，努力做到不拔苗助長。(4) 切實加強科學的金融監管，特別是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同時加強對外投資的監管。(5) 通過改革，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 [上接 9 月 8 日 03]

“影響中國發展的經濟學家”之六 影響中國區域發展的經濟學家

■ 白衛星 《經濟學家週報》副主編

胡鞍鋼（1953—）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是這一新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區域發展是國情研究的主要問題。他的若干區域經濟研究成果對中國區域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王建（1954—）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國區域發展有過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國上世紀 80 年代末實施的區域戰略，而王建發表於 1988 年 1 月 5 日《經濟日報》的《選擇正確的長期發展戰略——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確立提供了依據，為中國從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過渡到發揮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貢獻了智慧。“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區域發展的重大理論創新，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外貿易戰略和產業政策制定發揮了理論指導意義。

肖金成（1955—）長期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從事區域經濟的應用研究。他的區域經濟研究能夠直接為國家發改委決策參考，影響也是突出的。

寧吉喆（1956—）是一名學者型官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區域經濟規劃和投融资政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與產業政策、資源環境政策。由於他是國家發改委“老人”，又兼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對區域經濟非常熟悉，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范恒山（1957—）的學術研究領域廣泛，尤其是在經濟改革與發展理論研究方面造詣很深，主持或參與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

寫，提出了許多重要政策建議。在擔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經濟司司長、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辦公室副主任後，主要組織協調區域經濟方面的工作。擔任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以來，他對區域經濟的研究傾注了更多精力，特別是發起成立“中國區域經濟 50 人論壇”，邀請長期從事區域發展理論、政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具有較大影響的專家和中青年新銳，打造了一個研討中國區域經濟理論、政策和實踐的高端學術平台。范恒山身處國家發改委，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者，也是區域經濟的實際決策參與者，在這樣的平台，他能帶領一批區域經濟學者深化區域發展理論研究，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議，推動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王一鳴（1959—）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多年，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問題和區域經濟研究，主持完成《我國區域能源協調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等課題，對我國區域發展有着很大影響。

楊開忠（1962—）長期致力經濟地理學、區域與城市經濟學研究，多項重要研究成果為國家和地方中長期決策採納，其中有關中國區域發展研究成果為我國區域發展政策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轉向新的階段提供科學依據。有關中关村科技園區發展戰略規劃，為國務院和北京市作出加快中关村科技園區建設的決定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張可云（1964—）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合作、區域發展與規劃、區域經濟理論等。他既是區域經濟學領

域最年輕的領軍人物之一，也是區域經濟學界的“老人”——早在 1989 年就與周起業、劉再興、祝誠合作完成了《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他的《區域經濟政策》（商務印書館 2005 年版）、《區域大戰與區域經濟關係》（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01 年版）、《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基礎與歐盟國家實踐》（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2001 年版）等都是高質量的學術成果。

就“地區發展戰略”這個課題看，于光遠（1915—2013）、馬洪（1920—2007）和汪海澄（1930—）也是有重要貢獻的人物。特別是于光遠提出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的兩個維度，即全國戰略中的地區戰略和地區戰略中的地區戰略，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土經濟學、災害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有一定的關聯，于光遠作為國土經濟學和災害經濟學的倡導者和創始人，他的學術思想也對學界影響深遠。

除以上經濟學家外，董輔初（1927—2004）、厉以宁（1930—）、魏心鎮、胡兆量（1933—）、谷源洋（1935—）、陳佳貴（1944—2013）、宋曉梧（1947—）、李曉西（1949—）、李國璋（1944—）、鍾朋榮（1954—）、陳秀山（1954—2016）、白永秀（1955—）、喻新安（1955—）、田秋生（1955—）、蔡昉（1956—）、史晉川（1957—）、樊杰（1961—）等也對區域經濟有造詣，對區域發展均有一定的影響。

最後需要提一下費孝通（1910—2005），他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的《江村經濟》是影响几代人的学术名著。这位著名社会学家提出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上世纪 80 年代备受重视，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很大。

（完）

▶▶▶ [上接 9 月 8 日 02]

“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五 影响中国财政建设的经济学家

■ 白衛星 《經濟學家週報》副主編

王亘坚（1923—）长期从事财政税收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成果丰硕，还培养了一大批财税专业人才。王亘坚是我国经济杠科学科的奠基人，财政理论界价值分配论的创立者，并成为该学派代表，在我国财税学界享有很高声望。他揭示了财政运动五大规律，最早提出税收“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科学论断，被财税学界普遍肯定。上世纪 90 年代，他又提出依法、强制、无偿、定量的“税收四性论”，获得肯定。他发现并系统地阐述了物质利益规律，提出国家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新构想，创设税收科学新的学科体系，将原来的《国家税收》改为《税收学》《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王亘坚的学术思想对财政建设影响很深。

何振一（1931—）主要从事财政与财务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提出以责权利统一原则建设企业经济核算制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开创财政分配客观数量界限研究之先河。何振一提出财政职能范围随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模式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理论新说明，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财政效果评价的新指标体系，都在学界产生影响。他构建的以《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为主线，财政关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科新体系，被财政学界称之为“社会共同需要论”新的理论流派创始人。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有十多项成果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肯定并在宏观决策中采纳或做主要参考。

贾康（1954—）在财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多次参加国家

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多次被中央领导邀请座谈经济工作。2001 年，贾康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该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期间，他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财税改革方向、预算外资金的宏观管理、振兴财政的战略性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些学术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国务院有关方面和财政部领导的重视与肯定及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供给制改革，贾康的学术影响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都会在全国“两会”上就财政经济问题提出看法，影响范围较广。

高培勇（1959—）是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导者，是财政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深入探索宏观财政理论及政策，系统构建“公共财政”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引领我国的财政政策调整，对财政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高培勇还多次为中央高层集体学习作专题讲解，其财政经济思想丰富。对于中国特色财政学的认识，他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大胆预测，建立在科学认识现代财政运行规律基础上的中国特色财政学，不仅将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发展进程、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而且将引领世界财政学的创新发展。

陈宝森（1924—）、刘溶沧（1942—2002）、平新乔（1954—）、刘小川（1956—）、邹恒甫（1962—）等经济学家对财政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当然，他们的研究领域不限于财政政策，有的研究重点也不一定是财政，因此他们的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可能略显不足。（完）